

吹哨人制度吹响吹哨人集结号

■ 止凡 注册会计师

最新修订的《深圳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》建立了吹哨人制度,鼓励业内人士举报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业潜规则,企业正式员工向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举报企业食品安全违法行为,最高奖励可达60万元。(7月31日新华网)

所谓吹哨人制度,也就是知情人士爆料制度,主要是来自企业员工的举报。他们能够最早发现问题,他们吹响的哨声,能够大幅降低监管成本,让全社会从中受益。相比政府动用大量财力加强监管,吹哨人制度代价要低得多。而对那些无良企业来说,也可起到威慑作用,因为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。

在食品安全领域,违法添加也好,黑心食品也罢,企业主往往明知而故犯,有些还是一个行业性的潜规则。整个行业里,你做我也做,大家一起挣黑心钱。这种问题,有的比较专业,外行人很难发现,监管部门也往



往力有不逮,迫切需要由内部吹哨人来举报揭露。

事实上,很多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员工,也不愿意同雇主同流合污。最近几年,媒体报道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,几乎全是由内部人举报的。只不过,之前举报人宁愿找媒体也不愿意找政府。为什么?一是怕被和谐了,二是怕被报复,而且,媒体揭黑似乎更能立竿见影。建立吹哨人奖励制度,就是要鼓励更多知情人士更积极地向监管部门举报。

每有食品安全事件发生,我们总会抱怨监管的乏力。其实,我们的食品检测力度还是很大的,美国FDA反而要比我们低很多,只是人家监管效果更好,为什么?一方面,在美国,真正把企业看得最严的,不是监管部门,而是企业的竞争对手和各种维权人士或团体;另一方面,就是他们有着成熟的吹哨人制度。

美国的吹哨人制度不仅用在食品安全领域,而且被广泛应用于包括证券交易在内的各个领域。每年的7月31日,是美国的“全国吹哨人日”。2002年,时代周刊评选出的年度风云人物就是三位女性吹哨人,因为“她们冒着巨大的职业及个人危险去揭露通用公司、联邦调查局以及安然公司的事实真相”。

纵观国外经验,有吸引力的奖励制度,无疑是吹哨人制度成功的重要因素。企业员工也要养家糊口,举报之后他们可能在企业待不下去,甚至在整个行业都难以立足,没有吸引力的奖励,难以让他们鼓起勇气。深

圳最高60万的奖励,在全国来看貌似不低,但其实还可以更高,甚至上不封顶。美国吹哨人拿到几千万美元的奖励,都时常常见诸报道。

高额奖励之外,严格的举报人保护,当然异常关键。举报人保护,首先是个人信息保护,举报信明信片是送给监管部门的,结果却到了企业主手里,这种事情必须严禁严查严惩。举报人保护还包括人身保护,尤其是如果需要举报人亲自作证的话。就业保护,也是举报人保护的重要内容。美国的规定是,如果雇员因此遭到雇主报复,可以起诉雇主并且要求赔偿。

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,更是监管出来的。吹哨人制度的建立,对营造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,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与此同时,吹哨人制度,吹响的是吹哨人的集结号,我们都有义务监督社会,对不正当的行为、虚假欺诈的行为说不,关乎你我健康的食品安全领域,尤其需要更多知情人士勇敢地“吹响哨声”。

死了一半的钢厂怎么又复活了?

■ 邓海建 媒体人

去产能势在必行,然而实际进展却曲折反复。工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,今年上半年我国钢铁去产能的量达到1300多万吨,仅占年度目标4500万吨的30%左右。记者在宝钢、马钢和武钢采访了解到,只有该“硬”的政策硬起来,该“软”的政策沉下去,才能发挥最大效能,才能实质性地推进钢铁去产能工作。(8月4日新华网)

2016年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,就是“三去一降一补”。核心中的核心,就是给饱和产能“减肥”。目标誓旦旦,现实不忍卒睹。比如今年6月份,我国粗钢产量达6947万吨,折合日均产量231.5万吨,竟然超过4月份231.4万吨的历史峰值。一边是轰轰烈烈的去产能,一边是钢铁产量创新高——这落后而饱和的产能,在留与走之间缠绵难决。

千难万难,眼前利益最难割舍。钢铁产能做减法艰难,无外乎三个主要原因:一是今年二季度钢铁行情好转后,华中地区不少小钢厂纷纷复产,导致地条钢产品在市面上大量出现。二是地方部门在执行目标任务时,打了不少折扣。比如公开数据显示,河北省今年计划压减炼钢产能1422万吨,江苏省今年计划压减粗钢产能390万吨,山东省计划“十三五”压减粗钢产能1500万吨。折算下来,这些任务要是都能完成,今年钢铁去产能就不至于如此严峻。再一个,就是该硬气起来的执法还在挑软柿子捏。比如统计显示,新环保法实施后,截至2015年底,国内仍有20%左右的钢铁企业环保不达标。换句话说,如果按照法律法规的标准,钢铁企业把守法成本补上去,小钢铁企业自然会被市场洗牌”。该关停的不关停,该达标的不达标,空泛地呼吁减产歇菜,谁会自觉到拿自己的利益动刀子?

企业算企业的账,地方避地方的嫌,各自规避痛点和成本,一团和气的假象,就成了去产能最大的“敌人”。钢铁行业如是,其他落后产能领域莫不如此。结果就是,责任状很漂亮,不少深改旗帜下的企业也进入了淘汰阶段,但只要风吹草动,类似“死了一半”的钢厂,就马上满血复活。

更重要的是,去产能不是甩包袱,刮骨疗伤的成本如果全由企业来托底,恐怕所有大小企业都宁愿苟延残喘到最后一刻。比如马钢,由于非钢产业体量不大,加上所在的马鞍山市就业容量有限,大量富余人员难以通过转岗方式安置。另外,由于历史原因,马钢还背负着沉重的企业办社会职能,仅幼儿园就有13个,离退休职工四五万人。考量到当年的贡献或眼下的政策公平,多渠道解决去产能企业包袱问题,各种配套政策应早点“该出手时就出手”。

此外,在这些看得见的肇因背后,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:产能过剩企业,基本集中在钢铁、煤炭、石化、建材、有色化工等行业,而这些大多为国有企业。去产能之所以举步维艰,表面看是眼前利益的掣肘,深层原因则是国企改革的滞后。中央巡视组对国资委的批评,当然不仅是说给“婆婆”听,没有壮士断腕的国企改革配合,去产能必然会步步受阻。

国家发改委曾表态,比如钢铁去产能,责任书就是军令状,年底要交账,没完成的将被严肃追责。“死了一半”的钢厂又复活这件事,地方责任部门会深感不安吗?

地沟油回收“正规军”缘何成“叛军”

■ 杨玉龙 职员

“没有价格优势,收不到油,原来培训过的大部分收油工都走了,专用收运车还是新的,就成了摆设。”面对记者,说起两年前在成都组建的标准化地沟油回收队伍,成都市城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金华言语中尽是无奈。(7月31日《工人日报》)

据报道,2014年8月,为了推进行业规范化发展,成都11家回收废弃油脂加工生产企业,统一订购80辆专用收油车,组建了有2000名统一培训、着装并持证上岗的专业化收油队伍。企业与餐饮企业签订《餐厨废弃油脂回收格式合同》,并且废弃油脂企业在每台收运车上都安装了GPS行车记录仪,从收油地点到生产企业的产品也全部登记在案,避免废弃油脂回流餐桌的可能。

老实说,公司高管之前那些斩钉截铁的辟谣,未必就是演戏;只不过,在现代企业里,像万科那种股东说了不算高管说了才算的企业并不多,很多合并都是迫于投资者的压力,最终胳膊拧不过大腿。这次,Uber中国愿意“下嫁”滴滴,主要就是资方的推动,是优步中国投资方联合优步全球投资者一起施压的结果。

在烧钱竞争上,企业高管总是更趋感性,想要继续烧钱继续拼个你死我活;拿钱出来给企业烧的投资者,显然更趋理性,因为他们会感到分外肉疼。总这么烧钱,是投资者不愿看到的,于是我们总能看到,细分市场的老大和老二,最后握手言和。虽然Uber将放弃中国业务,但将在滴滴持有大量股份,可以借此摆脱巨额亏损。对滴滴来说,变最大的对手为合作者,卧榻之侧,暂时没有他人鼾睡。所以,这是双赢。

唯一感到郁闷的肯定是消费者。因为我们之前都是滴滴和优步拼命烧钱的受益者,这下人家合并了,烧钱大赛顿时没了对手,是不是再也坐不到便宜专车了?还有人担忧,会不会形成一家独大的寡头垄断?其实,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,这样的烧钱大赛是不可持续的,如果把之前的烧钱看成暂时的“占便宜”,而不是永远的“既得利益”,那就不会有太多的失落感。

可以肯定的是,无论新滴滴市场份额有多大,服务质量不会比现在更差,与我们想象中那些基于行政垄断的垄断企业,完全不会是一个概念。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,一家企业在细分市场的市场份额再大,只要把统计的范围扩大,它其实并不算什么,跨界竞争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困难,只要你懈怠,别人就会有机会逆袭。

更何况,很多大企业都不是被另一个大企业打败的,而是被边缘地带的小公司灭掉的。在互联网时代,市场份额只是暂时的,领先优势也是暂时的,你必须诚惶诚恐服务好你的客户,并且紧紧盯着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,要不然就会被无情地甩下。

所以,我们不用担心滴滴与优步合并之后会一家独大,进而让消费者品尝苦果。不会的,自由竞争最大的好处就是,谁让消费者品尝苦果,谁不尊重消费者的利益,那么他自己就不会活得很长。

当然,网约车车主一个月收入三四万的好时代,或许已经过去了。缺少烧钱刺激,车主的收入会回归正常水平,但仍不失为一份不错的收入,关键是你平衡心态,不能因为“过去怎样”耿耿于怀。有些红包,本来就是先下手的人才能抢到,而且抢完就没有了。

按理说这样的一套流程无懈可击,可为啥在实施的过程中却不尽人意。甚至一些经过培训后的“正规军”,又当了“叛军”。原因不难分析。

一则,“正规军”的营利少,在价格上不占优势,产废单位把废油藏起来,中止与正规企业合作,偷偷卖给出价更高者,正规企业收不到油“吃不饱”,自然,“正规军”的凝聚力、战斗力就逐渐减弱。

二则,对“伪军”的思想没做好。通过媒体报道发现,“正规军”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原来的收油散户,没有改造好就“改编”成军,“本性难移”,稍不顺心就会背信弃义、弃明投暗。

三则,对“地沟油”整个利益链条打击力度不够。售卖废弃油脂是自主行为,正规回收企业没办法做出限制,加之监管、打击力度不足,一些商家就会做出“撕毁合同”、背信弃义之举。

总之,地沟油回收“正规军”成“叛军”皆因为一个“利”字。为了根治地沟油,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《关于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意见》,一些地方也在同步进行治理,但收效几何?以昆明为例,作为全国首批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,2011年,就以政府令形式制定了《昆明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》,几年过去了,而昆明每年仍有3.6万吨地沟油流向小作坊。

一面是“地沟油”部分去向不明,一面是有暴利可图的灰色利益链条。“地点隐蔽、设备简陋、污水横流、恶臭刺鼻”黑作坊,带来的势必是“舌尖上的不安全”。如何破局,不能依赖于消费者当“鉴别师”、“试验品”,有关部门还须多上心,诚如有媒体所言,不能再让“地沟油”在监管缺失下继续“玩失踪”了。

摘掉地方社团“国字头”,更要砸掉山寨刚需

■ 薛家明 职员

民政部今日在其官方网站公布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(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)》及其说明全文,征求社会各界意见。《征求意见稿》提出,社会团体的名称冠以“中国”“全国”“中华”“国际”“世界”等字样的,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,地方性的社会团体的名称不得冠以以上字样。(8月1日中国新闻网)

长期以来,“中国营养协会”“中国烘焙食品工业协会”“中国建筑企业管理协会”等山寨社团,打着“中国”的名号,以假乱真、大肆敛财,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。为整治山寨社团,相关部门频频重拳出击。比如,民政部先后分十批公布“离岸社团”“山寨社团”名单;出台规定禁止退休官员为山寨协会站台,等等。而地方社团禁冠“国字头”,无疑是整治山寨团体的又一大招,必然会遏制“山寨社团”的野蛮生长。

但必须要意识到的问题是,不管山寨社团做的有多“真”,但只要查阅一下民政部民

间组织管理局的系统,不难辨出他的假。更何况,在实际运营中,山寨社团问题多多。比如,只要缴纳1.45万元的会费,就能成为“中国营养协会”的终身副理事长,这是任何官办协会都不可能干的“买卖”;国家规定,协会必须有独立的办公场所,协会的账号也应该是独立的,但许多山寨协会还停留在皮包公司的水平。显然,对那些拥有专业法律顾问的公司而言,揭穿这些“伪协会”的面目并不难。

在大多数公众的认知里,“买方”是山寨协会行骗的受害者。只是在山寨协会的蒙蔽之下,才上当受骗。可现实中,只要记者不爆料,山寨协会很少中招。那些所谓的“受害者”却很少告发山寨协会。“买方”何以对山寨协会如此宽容?一是发现上当后不想声张。但更重要的恐怕是,一个愿打一个愿挨,“买方”主动被骗。试想,在主动入瓮的语境下,这些“山寨获奖者”还会告发山寨协会么?

为何那么多企业主动上当受骗?一方面,部分企业拉大旗扯虎皮,用山寨奖项忽

悠消费者。另一方面,许多山寨协会背后却有着官方机构魅影。企业依附山寨协会,可以赚取超额的利益。

前不久,山寨“罗斯柴尔德”畅行清华的新闻,惊爆舆论场。其实,这并不是“山寨罗”在中国的首秀。据北京青年报报道,“山寨罗”两年至少参加17次活动,早餐会更是叫价万元。而“山寨罗”如此嚣张,并不是他的简历做得多“完美”,演技多逼真,而是大多数人借机搭车,不想捅破这层皇帝新装。这一幕与山寨协会横行何其相像?所有这一切让人不禁要问:还有多少“买方”是在坐等被骗?

拿掉地方社团“国字头”,无疑是相关部门整治山寨协会的一个大招。但山寨奖项的畅销,更让我们反思,有多少人在搭山寨社团的车进行包装,二次诈骗?因此,拿掉地方社团“国字头”,更要砸掉山寨刚需。只有消灭这些山寨需求,才能脱掉山寨社团的“皇帝新衣”,民间组织的生产生态才会真正明朗风清!

改地名别忘了算经济账

■ 黄春景 职员

因为在征集新地名的通告中附上了暂时拟定的地名“定军山市”,这些日子陕西勉县吸引了不少关注。有人就提议,算一下因为改地名而增加的开支。当然,勉县的地名更改,源于撤县设市的契机,即便沿袭原地名,行政区划的调整带来的支出也难以避免。但对于那些有意更改的地方来说,改地名的成本账,值得好好算一算。(8月3日《人民日报》)

勉县拟将更名为定军山市,但更名之后,单是换印章牌匾,一个县就可能花掉上百万,而需要更改的远不止章、印、匾,工商行政登记、地名标识、地图标注……很多东西都要跟着改,改了之后还要逐个通知,这可是一笔不菲的开支。当然,如果改名能够有助于提升地方知名度,推动地方经济发展,也未尝不可。但要看到,改地名并不是绝对的“制胜法宝”,必须精打细算,做好通盘考虑,切记盲目“随大流”。

应该看到,地方改名有利有弊。单纯的名字改动与带动经济发展并无必然联系,地方改名一定要算好经济账。任何地方在更名之前,都要对改名后增加的经济成本进行科学论证。这是因为,改名后当地的许多标识、居民身份证件等都要更改,会给当地增添许多额外的经济成本。因此,勉县拟将更名为定军山市,一定要持科学、谨慎的态度,理应先算经济账,再考虑改名也不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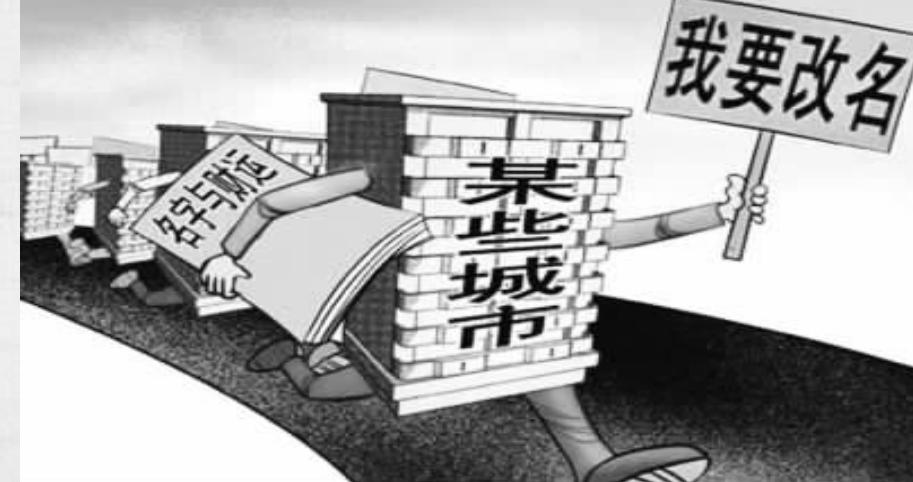
一个地方能不能改名,是一个值得深入剖析的课题。地方的名字是可以改,但不是所有的名字都可以改。地名不是决定一个地方能否强势发展的根本。勉县拟将更名为定军山市,无非是想借助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,增加地方知名度,以此促进当地经济发展。然而,一个地方的更名却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

程,仅是办理二代身份证就需要花费不菲的代价,其他方面的支出可想而知。事实上,改名并非地方发展的唯一捷径。30年前,义乌名不见经传,可现在一提到小商品贸易,人们首先会想到义乌。有谁听说过义乌要改名呢?30年前,深圳是渔村,而现在是经济特区。曾有网友风趣调侃道: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折腾上,你就是改成了“诸葛亮市”,改成为“郭靖黄蓉市”,是皮球还是皮球,是鸡蛋还是鸡蛋!

相信大家还记得犹新,襄樊更名襄阳,一字之改成本过亿,为此付出了不小的经济代价。

前几年,赵庄镇更名为“金寨”镇,与沛县争夺刘邦出生地。明眼人一看便知,争夺名人故里的背后,实质是想借汉高祖刘邦这块“活招牌”来营销自己。然而,地方改名并不能一改成名。石家庄市为何不改名?这是因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权衡利弊。我们知道,石家庄市曾被称为“世界上最大的村庄”,民间一度热议为其改名。但2009年8月,该市政府明确表示没有改名规划。为什么民间讨论得“热火朝天”,而官方却报以“冷冷清清”的态度呢?原来,据有关专家估算,若更改石家庄市名称,废旧换新,没有10亿元人民币是完不成的,而不可估算的经济损失要远远大于此。可见,一个地方想要改名还得先算算经济账。

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做任何事都要算好经济账,地方改名亦不例外。如果仅仅是为了放大撤县设市的宣传效应,就将勉县更名为定军山市,这样的改名除了折腾,还能带来些什么?窃以为,地名要保持严肃性、延续性,除非是影响到民族尊严,有损政治文化的名字,才需要改。冀望地方更名,少一些意气用事,多一些实事求是。唯有如此,才能本着科学、谨慎的态度衡量利弊,在地名更改上避免一时的头脑发热和盲从跟风。



相信大家都还记得襄樊,襄樊更名为襄阳,

一字之改成本过亿,为此付出了不小的经济代价。

前几年,赵庄镇更名为“金寨”镇,与沛县

争夺刘邦出生地。明眼人一看便知,争夺名

人故里的背后,实质是想借汉高祖刘邦这

块“活招牌”来营销自己。然而,地方改名

并不能一改成名。石家庄市为何不改名?

这是因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权衡利弊。

我们知道,石家庄市曾被称为“世界上最